

THE CHARACTER

O F

陈
建
◎
著

档案学的
性 格

ARCHIVAL SCIEN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CHARACTER

O F

ARCHIVAL SCIENCE

陈
建
◎
著

档案学的 性 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学的性格 / 陈建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 - 7 - 5201 - 4836 - 8

I. ①档… II. ①陈… III. ①档案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G2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9056 号

档案学的性格

著 者 / 陈 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吕霞云 王京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836 - 8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考古与历史学
项目经费资助

序 言

当“讲政治”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发展座右铭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概念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讨论的一个学科在很多年前就在“讲政治”，以至于“讲政治”成为它的精髓和 DNA，恐怕会引起一些非议。请大家先别急于否定或者下结论，陈建博士将用自己的著作去澄清这些学术观点。

《档案学的性格》一书讨论的是档案学科的基础理论，用陈建博士的话说，即档案学的“元问题”。元问题者，事物之根本也。政治一词自舶来之日起，就是社会发展之根本。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句话基本上揭示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国家的治理，或者称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此一来，问题就简单了，我们所称的档案是一种社会记录或者记忆，档案的形成是按照管理者规则运作的；“管理者规则”是一种来源于行为主体的“政治诉求”，档案就是这种“政治诉求”的产物。虽然不同的社会主体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国家意志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以“政治诉求”的产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政治性是毋庸置疑的。

根本问题解决了，下面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为什么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偏重于选择当下国家、政府以及档案行政机构所关注的问题，偏重于对国家档案行政部门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理论解读，偏重于针对有关档案实际问题向档

案行政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策？为什么中国档案学界存在明显的资政取向？那是因为这个群体自产生起，就有“坐在皇帝身边”“插入剑鞘中的剑”的情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其必然的选择！当然，“讲政治”，不是唯上司意志，也不是为尊者讳，而是实事求是为国家图发展、为民族图富强、为学科图进步。

学界人士不要一谈“讲政治”“政治性”就认为失去了自己的品格。正如陈建博士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总结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环境的特征，可以得出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五大优势，这些优势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官学互动的学人结构促进了中国档案学多元特色学人结构的形成；价值取向的资政辅政有利于中国档案学获得更大的政治扶持和推力；（行政）实践方法促成了中国档案学的务实学风和应用型学科面貌；研究对象的行政关爱提高了中国档案学的地位和声望；研究环境的政治关怀为中国档案学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巨大动力。

言及此，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已经比较清楚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对于这种客观存在，任何回避和过度阐释都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当代档案学人，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不能否认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学科的发展道路要与自身的遗传保持一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做明明白白的事：让我们与陈建博士一起去阅读、理解和研究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吧！

孙鸿杰

2018年11月于北京



前 言	1
导 论	11
第一节 研究动因与意义	11
第二节 概念界定	17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21
第四节 主要内容	31
第五节 研究思路	32
第六节 研究方法	32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33
第一章 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行政特色	35
第一节 行政特色结构——中国档案学人的独特结构	36
第二节 资政取向——中国档案学人的特色取向	43
第三节 (行政) 实践方法——中国档案学人的 特色方法	54
小 结	68
第二章 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权力建构	70
第一节 权力的干预：档案工作客观中立性的挑战	71
第二节 权力与档案形成的相互建构	75

第三节	权力与档案管理的相互建构	84
第四节	权力与档案利用的相互建构	102
小 结	115
第三章	中国档案学研究环境的熏染	117
第一节	政治发展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	118
第二节	政治制度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	124
第三节	意识形态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	134
第四节	政策行政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	141
小 结	151
第四章	中国档案学性格的形成、优势与发展	153
第一节	中国档案学性格的形成	154
第二节	中国档案学性格的优势	163
第三节	中国档案学性格的完善与发展	167
小 结	177
结束语	178
参考文献	180
致 谢	194
后 记	196

前 言

中国档案学历经 80 多年风雨走到今天，已经以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顽强屹立于中国学科之林，并且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政治性格，这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中是很有特色的。

本书所论述的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虽然是首次提出，但中国档案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探讨和争论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学界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讨论或者困惑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个话题，当然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措辞、话语以及具体所指可能存在差异，比如“政治性”“制度档案学”“政治—行政因素”“实用经验系统”“档案权力”等，研究领域的跨度也非常广泛，从对民国时期“行政效率运动”的研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档案学的政治性和党性问题的讨论，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档案学的反思热潮，再到今天中国档案学在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现实或体制困惑，一直到对中国档案学未来走向的探讨等，这些讨论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或者无法绕开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问题。可以说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是关系中国档案学学科性质、特色、面貌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问题，是中国档案学无法跨越的元问题。

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鲜明地体现在学科的方方面面，中国档案学研究的三个要素——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环境都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性格特色。

一 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行政特色

（一）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行政特色结构

梳理从古代至今的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角色结构可以发现，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角色结构显示了明显的行政特色：古代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大多指向了同一种角色——史官；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时期，行政界官员在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现代中国档案学时期，教育科研工作者虽然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体，但其丰富的档案行政实践经历也使其角色定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实践色彩，使学科发展带有明显的行政实践印记，改革开放后新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基本都缺乏档案（行政）实践的亲身经历，从当今倡导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念来看，这本可以成为提升档案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优势，但事实表明，这种优势不但没有使档案学理论产生实质性突破，反而招来了一些“理论脱离实际”的非议和质疑，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的角色始终没有独立于档案（行政）实践之外，而是始终与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始终对档案（行政）实践角色保持着较高的敬畏和尊重。

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行政实践角色从古至今始终伴随着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在有些时期甚至起着主导或者决定性作用。虽然综观各个历史时期，档案学术研究中行政实践角色的比重呈现递减趋势，但他们始终是档案学人角色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力量，这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角色构成的一大特色。

（二）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资政取向

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偏重于选择当下国家、政府以及档案行政机构所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偏重于对国家

档案行政部门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理论解读，偏重于针对有关档案实际问题向档案行政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策，中国档案学界存在明显的资政取向。学界对于资政取向存在不小的争议。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资政取向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文化层面的原因：资政取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政治思想层面的原因：“左”的思想残留与资政取向存在相当的关联；现实体制层面的原因：现实学术管理体制是资政取向的重要原因；主体自身层面的原因：学人现实关怀的因素抑或是学术压力和诱惑的因素；学科特征层面的原因：档案学科的学科特征是导致资政取向的根源。

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资政取向存在很大的合理性，一味批评这种取向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资政取向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档案学科的学科特征因素，也就是说，档案学科是应用学科，不是纯理论思辨的人文学科，档案学科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理论应用，理论应用的源泉来自档案的特殊功能——辅助决策，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档案学的资政取向来自档案的资政基因，如果否定了这种取向就动摇了档案学科存在的根基，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学科的衰亡。

（三）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行政）实践方法

中国档案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专门研究方法，但它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为研究方法带有很强的实践倾向，实践方法被频繁运用于档案学术研究中。而且在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与档案行政实践的关系极为密切，档案行政实践是档案工作实践的主体，档案工作实践的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因此，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实践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浓厚的行政实践色彩，（行政）实践方法可以算是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行政）实践方法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关注档案（行政）管理

实际，追逐档案行政机构推出的政策、法规及其标准，并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点和导向，将档案（行政）管理实践的指导思想与方法上升为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二是强调档案学理论与档案（行政）管理实践的协调性，以档案（行政）管理实践作为建构学科体系的重要标准之一，档案学学科内容与档案（行政）管理实践的内容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行政）实践方法作为一种特色方法，它体现了中国档案学人探索解决档案现实问题、关注国家社会发展形势、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偏好，它的存在具有相当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行政特色结构、资政取向以及（行政）实践方法三者有机结合，共同促成了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行政特色。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与政治行政具有深刻而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不能简单地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来评判，因为两者由于关系太密切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其实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蕴含政治行政的基因、流淌着政治行政的血液，具有为政治行政服务的传统，因此，用所谓学术独立与自由的大棍来棒喝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完全脱离政治行政是一种不尊重历史和事实的武断行为。

二 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权力建构

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档案与档案工作。档案与档案工作客观中立的观念早已达成广泛共识并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这种客观中立性并非毋庸置疑，现实中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客观中立性受到了权力的干预。权力对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干预呈现隐蔽性和合法性的特点。从文件/档案的形成到档案的管理以及档案的利用都渗透着权力的影响，档案和档案工作与权力相互建构。

（一）权力与档案形成的相互建构

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在有目的地对档案的形成进行建构，反过来，形成之后的档案也因其原始性和凭证性价值而建构和强化了权力。档案的形成与权力相互建构。

（1）权力对档案的形成进行建构。事实上，文件/档案的主要来源、存在类别以及实体内容都受到权力的深刻控制、干预或左右。具体表现为：政治行政活动是文件/档案的主要来源；权力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类别和功能的文件/档案；权力深刻干预文件/档案的实体内容，比如权力干预文件的归档、权力对档案进行造假等。

（2）档案的形成对权力进行建构。权力与档案形成的关系是相互的，档案的形成反过来也建构权力。档案的形成对权力进行建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档案的形成产生和确认权力；档案的形成保障和加强权力；档案的形成监督和控制权力。

（二）权力与档案管理的相互建构

权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档案管理程序进行持续的建构，档案管理程序反过来也在不断地建构权力。权力与档案管理相互建构。

（1）权力对档案管理进行建构。档案管理工作表面上是一系列规则、程序、方法和技术的组合，实际上它们背后一直存在权力的身影，权力决定规则。权力对档案管理的建构可以分成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权力建构档案管理体制、档案管理机构以及档案法规。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权力建构档案收集、档案整理、档案鉴定以及档案保管。权力对档案管理的建构和干预主要是通过档案工作者强力执行和实施相关的档案管理制度和规范

来实现的。在权力的积极干预和建构下，哪些档案被留存、以怎样的状态被留存、哪些档案被销毁等问题都被纳入权力的视野和控制中。

(2) 档案管理对权力进行建构。档案管理在权力的建构和干预下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实现了对权力的建构。档案管理对权力的建构主要体现为巩固权力、象征权力以及协助权力三个方面。

(三) 权力与档案利用的相互建构

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需求必然对档案利用工作进行积极的建构，而档案利用工作反过来也建构了权力，从而实现了权力与档案利用的相互建构。

(1) 权力对档案的利用进行建构。权力主体可以通过严格的档案利用制度和规范对档案的各种利用形式（档案开放、档案阅览、档案展览、档案编研等）进行监督、控制和建构。

(2) 档案的利用对权力进行建构。档案利用对权力的建构主要体现为辅助权力运行、保障权力利益、强化权力统治以及抵制权力统治四个方面。

综上，从档案的形成、档案管理一直到档案利用，权力对档案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了积极的建构，而档案工作的每一个阶段反过来也对权力进行了建构，权力与档案工作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在这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中，权力始终处于关键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权力对档案工作的建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而档案工作对权力的反建构基本上是服从和服务于权力的意愿和目标。可见，作为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档案和档案工作深深地打上了权力的烙印，这不能不深刻影响着中国档案学的学科面貌、内涵及其未来发展。

三 中国档案学研究环境的熏染

政治环境是中国档案学发展所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中国档案学受到政治环境的深厚熏染，这成为塑造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环境要素。影响中国档案学的政治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发展环境、政治制度环境、意识形态环境和政策行政环境四个方面。

（一）政治发展环境

政治发展环境包括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由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的特殊政治色彩，中国档案学受政治发展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政治发展环境既可以促进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将其引向毁灭。国家政治稳定，档案事业健康发展，政治改革有效成功，档案学就会繁荣；反之，档案学就会枯萎。政治发展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稳定程度。

（二）政治制度环境

政治制度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制度规定性。档案学的发展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中，不同政治制度下档案学的立场和观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学科面貌。此外，政治制度越落后，档案学受到的限制就越大，比如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些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的律令、规章制度以及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中总结的文献编纂思想中，它们受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宗法制度的严密控制，导致档案学思想始终处于实践经验的总结阶段，没有上升为系统的档案学理论，以至于在整个古代，中国档案学始终处于孕育时期；而民国时期档案改革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公开、统一、科学的要求，这是对古代档案管理方法的摒弃和革命，与封建社会的档案管理方法相比，显然是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也自然反映到了档案学研究中。

（三）意识形态环境

意识形态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政治方向上，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使中国档案学具有了不同的政治方向。古代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法关系为根本目的，档案工作受到严格控制，古代档案学（思想）也带有较浓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色彩；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中国档案学在产生初期就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性。

（四）政策行政环境

政策行政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科发展的推动力上，这种推动力可以表现为一种推力，也可以表现为一种阻力。推力方面，如行政力量成为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第一推动力，扶持建立档案教育科研机构与组织、档案学术管理等；阻力方面，如极“左”路线和方针等错误政策行政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扼杀。因此，政策行政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动力。

综上，政治发展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稳定程度，政治制度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学科面貌和自由程度，意识形态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方向，政策行政环境关系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动力。中国档案学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深厚熏染，政治环境是中国档案学与生俱来并伴随其始终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档案学所必须面对并设法适应或者改善的外部环境，任何逃避和否定政治环境影响的观念和认识都是错误的。

四 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形成、评价与发展

（一）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形成

心理学研究表明，性格是主体内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相